

网络文化的价值定位 与未来导向

王 岳 川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网络文化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具有多元性、众声喧哗性和非权威性。媒体时代的文学写作强调一种“非审美”的倾向,网络写作使得个体化写作得到了最大的表现平台并提供绝对自由表达的机会和场所,也因为无边的写作导致了文学权威的缺席和意义的平面化。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网络话语平台,对“媒体伦理”和“媒体精神”进行哲学反思。

关键词:网络文化;媒体权力;价值定位;文化导向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5-0099-07

近些年,面对大众文化的播撒,网络世界的勃发,影视传媒的中心主义,广告媒体的经济权力话语,人文话语和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正在发生着变化。就全球化语境而言,传媒消费主义已然触及到时代精神和个体享乐的问题。在后现代高速发展的经济战车中,人们基于对社会个体身份和历史虚无的理解,不再将理想主义作为自己的存身之道,而是将消费主义作为达到世俗幸福的捷径。于是消费成为获得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关系的关键环节,甚至成为支撑现行体制和团体机构生存发展的润滑剂。消费不再是为了刺激再生产,而是在名牌政治化和时尚崇尚克隆中呈现当代崇洋心态——商品拜物教和西方中心观念。“消费”心态观念与“西方”名牌政治,终于成为一个铜币的两面。

事实上,消费社会已经进入一种文化身份的符号争斗中,商品权力话语消解了高雅文化的壁垒而与通俗文化合谋,轻而易举地通过大众传媒侵入到

当代文化的神经,将日常生活作为市场需求和世俗文化模式设定为当下社会文化的普遍原则,并力图将消费主义作为当代人生活的合法性底线。于是在哲学“元话语”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话语消失后,人们在焦虑中寻找挽救信仰危机的解救方法。然而传统价值伦理和审美趣味深度的消失,使得意义“表征紊乱”成为时代的症结,本能欲望的满足和怂恿成为消费时代的焦虑[1]。可以说,大众传媒消费时代问题的袒露性,显示出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并对当代文化深层问题提出了新的质疑,警醒人们在消费社会中关注生命的本真意义,揭开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导向的新价值尺度。

一 当代媒体中的文字与图像互动

传统美学认为,“看”是一种感性过程,属于感性认识;语言是经过思维和推理过程的,是思维的工具。所以,图像同语言相比要低于语言。今天有人认为视觉和思维同样重要,但是思维过程中所具有

收稿日期:2004-06-18

作者简介:王岳川(1955—),男,四川安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种种心理过程在视觉中同样存在,并不意味着视觉力就是悟解力。这是因为,“看”只是初级直觉在起作用,由于初级直觉调动了人一生的积累,有相当部分是对对象的合理把握。但如果要对事物进一步加以更深入的判断,必须有知性与理性的参与,仅仅靠“第一眼”的初次直觉是远远不够的。如看达芬奇的《蒙拉丽莎》,如果仅仅看到一位美丽女性的微笑是不够的,还需要深一层地追问:在微笑表层魅力的背后呈现了什么?呈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从神学中心中走出来的精神觉醒、生命自证、价值重估、人的欲求的合法性,以及整个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文化心态的启蒙性。可以说,技进乎道,要用理性精神之眼,才能看到画面构图色彩背后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含义。

有一种说法,当代文化已经进入“读图时代”,这意味着电脑网络、影视卡通、一般图片传播超过了文字传播的分量。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起码文字在所谓的“图像时代”仍有其强大的深拓性、超越性和感悟性功能。值得注意的传媒现象是:思想的边缘化和学术休闲化,文字和图像思维兴趣的分化——大众在读图,而考高学位读高深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西方大学注重读原典,将时代精神的原创性(文字)和流行趣味(图片)分得很清楚。读图并不是不可以,但读图成为时代风尚而排斥文字内核就成为了问题。应感受图片之中之后的意义那种无言之美,这些都与文字的意义深拓性分不开。

不妨回到历史看看。人类从“手写时代”,发展到“印刷时代”,现在进入了“信息传媒时代”。在手写时代,文字的产生曾惊天地而泣鬼神。天地鬼神之所以为之动容惊泣,是因为文字表现了人类抽象思维的发展,人类从此能够浓缩历史和文明,把握事物的本质。而在信息传媒时代里,传媒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图像的泛滥,人类渐渐与文字相隔离,把对文字的惊叹变成对图像的玩味。虽然图像的信息容量大于文字,但并不是精于文字、高于文字、深于文字,而是使人们的阅读趋向平面化。如一些大学生写先秦方面的论文,不再读原著而读蔡自忠漫画《论语》《老子》《庄子》等,其结果可想而知。漫画古典对普及知识有用,却因简单化、类型化、说教化,而使作为解释微言大义的思想史学术史走入误区。

就人类文明发展而言,原始初民岩画洞画结绳记事,因为初民文化初开;而今天暧昧的手机短信由

写手拟好,人们只是狂热地互相传播,或人物表情图片已经设定只需挑选其中之一即可发给对方。于是,思维简单化、自我浅化、幼稚化现象出现了。这种后现代式的类型化图案,被用来表达类型化的感情,于是青年一代的思维就不知不觉从丰富多样性到了类型化,甚至导致知情意——感性知性理性三者分离。

当然,从正面意义上讲,图像反应感觉时具有丰满性,扩大了感性的阈限,却萎缩了知性与理性的延伸,使人感觉知性理性未能协调发展。同时,一味强调感性的愉悦,还可能萎缩人的价值判断的公正性,使人的心性价值判断变形。如日本漫画片《蜡笔小新》将儿童发嗲化、甚至性爱化;《樱桃小丸子》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在日本不播而专门针对中国青少年搞反文化反道德教育,使下一代逐渐丧失道德观和正义感;《南京大屠杀》媒体游戏设计成杀中国人越多,武功就越高强而可晋升一级,使孩子们从小就接受文化暴力观和侵略合理观;日本动画游戏中,中国孩子最后只有击落一架中国飞机才能获得成功,这是典型的非正义性。这说明战争的偏见、文化非正义性、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强者为王、搞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灌输是多么可怕,但媒体却在图像刺激的“好玩”中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这种价值颠覆。

今天大众读图,只是在看而不是深究在“看什么”,不去想图像背后的价值观。人们看的是浅化的图,不再调动心性追问,不再思辨和判断。如一位西方著名雕塑家说,洲际导弹是当代最好的艺术和图像造型——这已经丧失了起码的艺术精神判断;美国打巴格达的电视画面,恐怖主义攻击美国世贸大厦乃是人类之大不幸,然而却有不少大学生说这是比《007》更好看的令人激动的“大片”——如果这些洲际导弹是飞到他的家门呢?这表明:思想的幼稚化、精神的感官化、艺术的丑陋化、生活的非意义化成为当代精神低迷的主要表象。

在视觉思维流行时代应该注意非视觉思维层面,这是人类进化的最重要成果。处于“图文时代”的一些人认为,将来世界是“图图时代”,文字将在网络社会中彻底出局。而我认为,文字是不可替代不可偏废的,将来应是“文图时代”,文字仍然要占据精神原创性和文化再生产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大学生入学上升到应届生80%以上,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全民的40%以上的时候。在我看来,只有

坚持文字和图像并重,而不是用图像取代文字,或者排斥图像只要文字,达到这样一种和谐的境界:既坚持文字的语义优先性和意义伸展性,同时又拓宽了图像的在场性和真实性,使媒体文化形式的未来发展有了新的地基和风格:注重图文亲和性和整合性,既不像图像中心主义那样抱着图像的唯一性和平面性,而是不离文字不贬文字,坚持文字对图像意义的提升。反过来,文字也不取代图像,而是将图像背后的微言大义发掘出来,醒豁起来。

作为跨文化艺术门类的网络文化,将进一步把自己定位为跨文化艺术形态,将文字的“意义注入型”与“图像感受丰满型”整合起来,打破文类的界限,求异存同,和则双美,离者两伤。更进一步遵循艺术规律,在文图时代将图与文加以新的整合,激发出二者的和谐状态,从而使媒体文化成为文图时代精神平台。未来媒体文化发展的意义在于,在图文时代人们不仅有老照片似的怀古,也有相当直观的图像把握能力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正反面问题作直接反映,使人们在感受新生活和新气象中,注意到图像所不能达到的文字深刻性;关注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问题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心理和情感的新问题,注意生态环境的破坏的恶果,呼唤具有绿色文化生态文化意义的新事物。

二 网络是新世纪文化的新型播散方式

网络在中国呈几何级数增长。信息不对称和不平衡状态的出现,意味着关键性的信息在网上传递时,第一世界在英语信息占90%,在传送与获悉超量的信息而获得快速的进步;而第三世界在本土信息占百分之几的情况下,传送与获取信息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好者更好,差者更差”的杠杆原理出现,使得第三世界在信息方面处于低谷。改变这一处境的方法是学术精英要进入与西方的正面对话,思考全球范围内的前沿问题,同时,将本民族的文化、思想、信息用英语的方式送出,同时,尽可能地增加本民族的文化信息传送量和文化含金量。从模仿抄袭西方文化到创立自身的全新文化,使西方对东方或中国文化具有全新的认识,在具有对话的前提下,逐渐地获得信息对等和平等交流的机会。

中国网络不可能脱离全球网络,只能在全球网络系统中连成一个整体。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中中国不应“被化”而完全丢掉自己文化的根基,而是中西“互化”而形成网络文化的良性互动。这

意味着中国网络正在走向成熟,不再背对世界,不再沉醉过去。在传播中阐释中国,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不再是“肢体文化”,而正在成为“头脑文化”。通过网络传播中国文化的关键在于,不相信中国将永远落后,不相信中国文化永远低人一等,不相信西方文化会成为全球文化,不相信中国文化的未来只是英美 pop 文化的集散地。因此,文化传播是一种文化互动,在减少文化敌视中的文化过滤,是在文化过滤中获得中西文化双赢,是在文化双赢中达到东西方文化的常态和谐,一切文化敌视、文化霸权都将不再合法,一切有效的文化整合、平等的文化心态、文化平视的努力都值得尊重。

网络文化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因而具有不同于现代性的三个特性:多元性、众声喧哗性、非权威性。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清算,它要消除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霸权主义、中心主义而将一种傲慢的知识态度还原为一种平等的知识对话,将一种中心主义的自大迷恋还原为平等对话中的新意义产生,将一种过分精英主义的态度还原为普世性的大众文化。

网络文化应该是整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的优良因子,再叠加上传统文化的文明碎片,创下未来文化的新的形态。电脑网络传媒对大众文化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其对人文社会景观有提升和降位的双重可能性,这种变化可以使文化的精英立场丧失部分空间,但也可以使真正的学术思想获得一个平台。人们面对自己的问题会因信息过多而造成某种困惑,甚至由于争论不休而导致权威消失,而造成文化断裂。但是,不管怎么说,网络使平民的声音能够发出,使得多元对话成为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绝对的声音,而先要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因此,我们在某种文化断裂中也可以修复我们的文化裂痕,使网络文化在国家的政治结构变化中起重要作用。目前,网络还处于中低水平运作上,在真正的民主制度建立前沿思想探讨和高峰对话方面还不足。但网络文化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平台,那就是最大可能的平民化、圆桌会议化、多元多种声音化。这种形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民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赖于网络文化自身的理性和节制,以及网络法规的健全。网络民主内涵意味着文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独断声音的消失,而使对话主义、多边主义、多音对话成为常态。

这对于文化制度的创新,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从来都是多重联系的,从来都是不可割断的。底层的民间文化往往有刚健清新的东西,上层文化也有油滑和暮气沉沉的东西。两者只有在不断摩擦、砥砺、整合中对自我加以扬弃。如何使网络具有一种法制化、有序化,成为大众文化,具有美学意义和价值是关键。

网络的法制化很难操作但必须启动,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和自由性是网络文化具有美学意义和价值的核心,另一方面网络需要有序化和法制化。这意味着,我们是在相反相成的矛盾中前进的,没有不要法律的自由,也没有丧失节制的所谓开放。应在自由与法制、开放与节制、感性与理性之间做到某种平衡。文化创新同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同样重要。东西方文化对话和平衡是人类从核大战的噩梦中逃脱的惟一的通道。世界大战将没有赢家,这意味着只能通过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使人类得以和平生存下去,而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生存,其质量赖以彼此的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

网络文化有其正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人际关系处于一种彼此信息不对等的状态,使某些人可以在隐蔽自己身份情况下说出内心真实的语言和私人的语言。其正面价值是可以随心所欲坦言心扉,或发人深思、或启人心扉、或揭露时弊;其负面价值在于:产生恶意攻击、揭露隐私、编造谎言。同时,人因超负荷的信息堵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使整个社会出现了信息过剩和人性遮蔽。网络的发展实现了大众的狂欢,在个性极端张扬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尤其是群魔乱舞和娱乐场所化确实令人堪忧,尤其是对青少年而言,因为文字的阅读要经过思想的领悟,而网络图像的阅读则带来肉身的快感,于是快感将战胜领悟,青少年将在快感中忘掉思想和文化而沉浸在图像的愉悦中。应杜绝网上黄毒,增加文化含金量,强调大众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因素,并使精英文化具有某种超前的价值存在和观众审美共识,只有这样,群魔乱舞才会变成感性理性统一,娱乐场所才会成为文化空间。

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清洁的语言、明晰的逻辑、令人感动的叙事、对他人存有善心的期待,才能够凸显网络文化的品味和趣味。一切丧失品味和趣味的对话和攻击都近乎无聊,一切无聊的话题无论多么

津津有味地谈论都只能是苍白,一切苍白都只能说明对网络责任的逃脱。在我看来,网络文化将在未来世界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我们要学会适应它,充实它。在这个平台上,没有人会愚蠢到去反对它,也没有人会轻飘到去仅仅娱乐它。它的重量将在未来的岁月中逐渐显示出来,而这种重量是传承的文化的重量,是交流的对话思想的重量,同样也是文化论战的前卫意识的重量。希望这个平台成为人类沟通你我他的平台,同时也是使每个个体提升自己心性的平台。

三 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网络话语平台

知识分子离不开传媒,甚至可以说,正是印刷媒体的出现,才使得知识分子得以冲破中世纪神学和贵族权力的控制,成为自由思想的精英。如今,在这个媒体平台遍及世界的时代,知识分子还不能消亡,起码,这个媒体平台上运行的语言、叙事、话语、思想还应该以知识分子为基点。尽管有的知识分子已经“突围”而进入大众话语狂欢中,但这仅仅是个体的选择,并不成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逃亡”的写照。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不仅在于其专业成就,而且在于其独立精神、人间情怀、反思立场和超迈精神。知识分子可以用传媒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同这个平台进行充分有效的合作(罗素、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同传媒都成功地合作)。如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曾经同出版商、报人、广播电台打交道一样,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除了在大学讲堂上讲授思想学术,还可以接受电视采访,在各种媒体讲演,在网络解答网友的问题,甚至在数据库中成为今日大学远程教育的良师。

知识分子不可能拒绝传媒。说到底大众传媒是中性的,低俗或者错误的东西可以在上面大行其道,高妙而健康的思想也可以有自己的广泛受众。因此,学者与传媒如果出于经济炒作和政治动机的合作可能是一种“合谋”,并不可取。而学者与传媒如果是传播独到的思想、重要的理念、战斗的檄文和对重大事件的文化态度,那么,传媒就将成为社会的良知和价值公正的表征。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社会的进化,使得社会各阶层都能减少信息垄断而正当地获得自己关注的重要信息。同时,人们还能从知识分子具有世界眼光和人文视野的言说中,看到他们为大多数人说话和为民族的根本利益着想的知识修为和道义情怀。

当然,一味地在媒体上播撒一些欲望化、世俗化、消费化观念的知识分子也并不少见,这必然引起大众和知识分子关注和批评。在这世俗化浪潮的扩展下,精英文化的高雅终于抵挡不住世俗功利文化,传媒在强有力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话语怂恿下,变得可以替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而直接成为大众消费欲望的推动者。人的异化现象严重,盲目从众趋时的倾向成为社会心理主流。因此,知识分子除了运用传媒传播思想以外,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对这个传媒平台加以修理和维护——坚持不懈的批判精神,对大众传媒出现的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追问和人类文化前景透视。社会学家默顿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蜜月往往是短暂、粗鲁和别扭的。”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不仅要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还须注意与传媒从业人员在血统上的亲缘性,以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学术眼光疏离“传媒的炼金术”。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不是畅销书写手,才不是变体的广告商,才能够具有比普通受众更强的文化病毒免疫力,才能使批判声音在传媒上正常发出并产生共鸣。只有知识分子和传媒的关系破除了“合谋”以后的正当性,知识分子的媒体言说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批判精神和价值重量。

今日世界的“数字化生存”绝非技术问题,而是更多地承载社会公共伦理和文化良知——媒体哲学的反思是对“媒体伦理”和“媒体精神”的反思。电视论坛可以最快最广地传播学者思想风采,网络可以建立学者思想库而成为“网络思想史”,使得思想的自由表达远远超过纸介媒体。众多媒体访谈可以使受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学术大师和知识精英对世界重大事件的基本看法,并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方式反馈自己的意见。无论如何,思想的多元局面比一元专断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媒体带来的宽松自由的公共领域对话和真实互动“主体间性”交流平台,使媒体信息生产同日常生活相比,更能对受众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并有可能形成公众舆论和干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

当代法国社会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日益明显。知识分子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论辩之外,而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政治权力。这

些新贵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优越性。传统文化发现自己被贬到无用雌伏的地位,传统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这一套机构只是电视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电视成了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2](14—15页)。

这提醒我们,在多元文化中,知识分子对媒体操纵者和媒体集团垄断者的警惕并非多余,因为,如果跨国传媒集团垄断了越来越多的传播渠道,这种趋势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将会产生怎样严重后果?会使得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化鸿沟撕裂到怎样的程度?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对话成为怎样的不对等局面?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在传媒时代的哲学思考刚刚开始,然而,这种媒体哲学的思考,是这个时代学术良知尚存的标志。

四 对网络文学与媒体权力的生态价值反思

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形成,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化中的跨国媒体问题,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和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即民族主义/大众特色这一极来定义。以通讯自身来定义它们(如规模、技术、政治)是偏颇的,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很少能战胜大众媒体。它们的真实意义是:找到传媒的“反霸权空间”。在世界各地,一直都有少数人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但是只是在最近,消费主义才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这样提出问题,已经不再是对消费主义本身的直接抨击,而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上文所述的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抗议。这样做的一

个结果之一就是呼唤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在对私人空间或身体欲望重视的同时,同样有个“度”的问题,丧失了个“度”,就会从有效的意义逆转成为丧失了合法性的无意义行为。自我的身体性是存在的真正行为主体和意义主体。关于身体欲望话语,当代媒体无疑是有新的开拓的,但或许从身体和性爱看人性,以及表现这种欲望的疯狂和冲突还不够。因为问题还在于,对“身体”和“欲望”的过分强调,可能会逾出对生命本体生命感觉的正当伸张的限度,走向绝对化私人系统的不可沟通性。如何从更大的跨国或世界文化视野审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禀赋”,以及自我的真正存在意义和生命归宿,似乎还可以再讨论,甚至还可以从“自我身体”和“他者身体”入手进行深度描述,或许别有洞天。当代影视传媒(包括广告)对自我的身体性作为行为主体意义的强调,甚至对“身体感”和“性”的过分张扬,既重要又危险。重要在于这是对生命本体的正当伸张,危险在于容易绝对化而为人(欲望者)张目。

可以说,媒体时代的文学写作强调一种“非审美”的倾向。在感性骚动之中,“除了对精英艺术的绝然拒斥外,在美学方面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变革。除了其‘革命’热情以外,其政治观点也只不过是书卷气十足的老生常谈”[3](p.6)。理论观点的旋生旋灭成了后现代魔幻动力的正面显现,甚至“代”的观念,已从30年为一周期减缩到10年。新流派迅速崛起,又迅即烟消云散,一代一代人的写作在数量上的更迭替换了质的变化。这一问题值得中国学界重视。当下,网络文学写作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文化短期行为。

在媒体文学书写中,我们需要弄清:网络写作的主体的匿名状态尽管因为作者隐身而赢得了自由,但是集体的隐身状态使得写作的公正性和人文署名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于没有身份的写作读者很难有发自内心的首肯;同时网络写作的内容无所不包而遁入“无物之词”,使媒体写作全面更换了主体并丧失召唤读者接受符号信息之间互应关系。正如博德里亚所认为的那样,媒体假定了语言和真实客体之间的非关联性,在能指的随意串连行为中舍弃被指涉物的真实,而只是在语词与意象间勉强架起的陌生化的意义建构。于是“仿像”(simulacrum)、“内爆”(implosion)、“超真实”(hy-

perreality)、“消费”(consume)、“致命”(deadliness)等[4],成为网络时代的文学地盘做大而精神做小的写照。这促使我们关注着一个事实:网络上的文学精神产品创作的印迹越来越少,而文字流动和感觉遭遇式的写作成分越来越多;文学经典或写作和阅读正在媒体平面写作中被消解,其写作方式和阅读方式在作者和读者那里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偏移,这种泛写作和随意浏览造成了读与写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随意性和偶然性;互文本的无穷链接式的阅读对写作的无边语词搜寻,意义在昙花一现的流逝中成为下一个文本和意义的连接耦合,瞬间的偶然点击只能在互文本的海洋中越行越远,出自无心无神无意的文字邂逅成为网络文学的泛文本交流模式。

网络写作使得个体化写作得到最大的表现平台并提供绝对自由表达的机会和场所,也因为无边的写作导致了文学权威的缺席和意义的平面化。这种文学写作不再将文学本身的精神意义作为主导,而是将自己的感性欲望和内心压抑宣泄释放,这必然使写作与非写作的界限归于消失,写作和不写作最后将没有区别,那种传统写作的“不朽的盛事、经国的伟业”,在媒体写作中成为历史,写作不再是生命意义的楔入,而仅仅是无法经由其它生命方式得到化解的自我倾诉冲动,是在内心的欲望召唤中的无法停息的文字把捉和键盘操作,于是在一片捧声或者一片骂声中,展开新的文字围剿和文字引诱^①。面对这种写作,传统写作的精神直观正在无限萎缩。

不管怎样,网络文化将在未来世界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它的重量将在未来的岁月中逐渐显示出来,而这种重量是传承的文化的重量,是交流的对话思想的重量,同样也是文化论战的前卫意识的重量。希望这个平台成为人类沟通你我他的平台,同时也是使每个个体提升自己心性的平台。因为,丧钟为谁而鸣?不是为他人而鸣,而是为我们每个人而鸣,因为,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死亡的一部分,而其他文化的死亡也是我们文化死亡的一部分。人类具有了将人类的苦乐放在心上的深层意识,人类就会变得成熟、健康和充满阳光。相反,人类就会在彼此敌视冷漠中,在网络的价值平面中滑行,而丧失人类丰富的可能性。我想,地球存亡、未来发展、精神生态、人类远景,在我们每个人敲击键盘的反思和实践中。

注释:

①诸如美女作家、木子美之类的身体写作或展示等,皆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者,甚至就是先于理论的践行性者。

参考文献:

- [1] Cf. Jean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1975.
[2] 布迪厄. 关于电视[M]. 许钧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3] Charles Newman. *The Post - Modern Aura, The Act of Fiction in an Age of Infl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Jean Baudrillard.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Semiotext, 1998.

Value-Position and Future-Orientation of Web Culture

WANG Yue-chuan

(Chinese Institut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Beijing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web culture is a kind of cultural form growing in post-modern society, of diversification, conflicting voices and non-authority. The literature writing in the media age emphasizes the trends of non-appreciation of beauty. The web writing provides individual writing with a displaying platform and the opportunity and space of completely free expression, but also leads to the absence of literary authority and the plane-becoming meaning for its boundless writing. Therefore, the intellectuals must face with the platform of web communication and make philosophic reflect upon "media moral" and "media spirit".

Key words: web culture; media authority; value position; culture orientation

[特约编辑:胡鹏林;责任编辑:唐 普]